

# 文明崩溃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 衰变现象研究

徐良高

汤因比认为文明像各种生命一样，会产生、成长，也会衰亡、崩解。在西方学术界，对文明崩溃的研究则是文明探索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一个个神秘消失的古代辉煌文明和当今社会的种种危机，这也是学术界的必然反应和思考。对于文明崩溃是灭亡，还是一种解析和重组，崩溃的过程如何，崩溃的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还是内外诸因素多变量系统的失衡等等均有热烈的讨论<sup>①</sup>。

文明的崩溃指什么？文明崩溃，有时我们也可称之为复杂社会的衰变，往往表现为大政治体的碎片化和特定文化传统的中断。文化传统的中断包括作为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信仰体系，甚至语言、文字系统的消失，尽管它们对其它文化可能有一些潜在的影响。文化传统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作为这一文化传统主体人群的全部灭绝。政治体的碎片化指大政治体的解体，中央核心行政机构消失或失去作用，原来的大政治体崩解为诸多小型政治组织，甚至村社自治体，人口减少，政府角色不明显，宗教活动衰减。与大的中央行政体密切相关的公共设施、作为权力地位标志的纪念碑式建筑和各种精美象征品不再被修建、制造，甚至被破坏、废弃。支撑这类政治体的文化传统中断。社会并不总是前进的，越来越走向完美的。崩解对一个特定社会组织体来说是一场灾难，是一种崩解和终结，但从人类社会历史来

看，并不一定是灾难，而是面对危机要求社会组织改变的理性选择，是特定社会的一种调整、再适应和面对挑战的反应。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极端不稳定是糟糕的，但过于稳定也不是好事，因为社会缺乏活力和面对危机的及时反应机制。一些古代文明崩溃后未能再度兴起，如玛雅文明；但另一些文明在一次次的崩解、调整后，以既继承又发展的新形式再生，如中国古代一个个旧王朝的崩溃、战乱及随之而来的新王朝的诞生。也正是这种特殊现象使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其它古代文明，是延续的，而其它古代文明都是断裂的。

文明崩溃的原因有多种，总结起来可分为外因和内因两大方面。外因包括自然灾害，如长期的干旱，持续的洪水，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流行性疾病，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的过度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比如土地贫瘠化、盐碱化等）。战争，包括外敌入侵、战败或过度扩张，过度适应于特定的环境或依赖于特定资源而缺乏适应的弹性与灵活性，特定资源的枯竭导致文明的崩溃。内因包括能导致政治体自我弱化和分裂的不同统治群体和机构自我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比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

国外学者对世界几大古代文明的崩溃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对我们都很有启示。

关于印度河古代文明崩溃的原因，学者们

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100710

认为“在印度河城市衰落中扮演角色的因素，是同刺激它形成的因素一样多种多样的”。有人认为是洪水破坏了文明的农业基础和经济结构。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的衰落是说印度——雅利安语的雅利安部落的“入侵”或“移民”导致的。也有学者从内部找原因，认为过度扩张的贸易网和政治控制，很容易被河流改道、洪水和庄稼歉收所破坏②。

关于早期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的崩溃，学者们认为城邦的兴衰与灌溉农业密切相关。水利工程和灌溉农业的发达导致人口的增加和城邦的兴起。而过度的灌溉导致土壤的盐碱化，引起农业收成的下降，由此导致人口减少，城邦衰落③。

关于玛雅文明的崩溃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④。涉及领域宽广的各种解释理论都被提出来，包括自然环境的恶化和人类活动引发的恶性后果。有影响力的一类理论认为由于过度垦殖造成环境恶化——地力衰竭；侵蚀作用使得土壤淤平了浅湖，改变了重要的水源供应；或者野草太过茂密，以致玛雅人不能使用原始工具进行耕种。从环境角度提出的理论还有各种引申——环境基础不足以支撑一个先进的社会体系，因此在劫难逃；人口增加耗尽了资源；玛雅低地疾疫横行等等。

第二类理论侧重于社会方面——玛雅社会结构的消弱导致其内部瓦解；或者来自外部的入侵威胁，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诱发战争，并造成玛雅精英阶层的毁灭。在这些从社会角度提出的解释理论中，埃里克·汤普森的观点是最有影响力者之一的，他认为农民由于日益加重的贡赋负担和被迫供养不断增加的外来异教信徒而产生不满情绪，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矛盾尖锐起来，引发流血革命，统治阶层和他们的宫殿神庙都被摧毁了，于是玛雅人回到

组织程度较低的农业社会形态。他以后进一步认为，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崩溃，营养不良和疾疫也是雨林地区人口灭绝的原因。

许多学者提出，来自尤卡坦地区或者墨西哥湾沿岸的军事入侵在玛雅瓦解过程中也有重要作用，但是承认这种军事入侵是在玛雅内部瓦解而出现力量真空时发生的，入侵本身并非玛雅社会崩溃的原因。

《古典玛雅文明的衰亡》（T·帕特里克·卡伯特编辑）一书的作者们详尽检讨了关于古典期玛雅文明毁灭的全部问题，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玛雅文明瓦解的理论模式被提出。按照这种模式，特奥蒂瓦坎城影响的衰减使得玛雅本地贵族阶层增强了独立性和控制权，他们通过建造前所未有的更为精美的金字塔向臣民、邻居和竞争对手炫耀力量，贵族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社会差距加大，贵族阶层成为世袭制，而更为沉重的负担则被强加到普通民众身上。人口数量、密度和压力的增长造成食物供应紧张，迫使玛雅居民采用精耕细作和集体生产的农业方式。对土地的渴望导致在相邻玛雅社区之间以及玛雅社会与相邻外部社会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营养水平的下降（在古典期晚段墓葬中的骨骼上有所证明）使得对地方性疾病的免疫力下降，有可能暴发流行性疾病。玛雅文明的社会组织管理水平不足以应付这种空前的压力，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玛雅文明出现迅速的、灾难性的崩溃；同时战争、营养不良和疾病在广大范围内造成人口锐减，直到残存下来的居民能够在低得多的人口密度和社会组织水平上重新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

由于中国古代文明保持着表面上的延续性（注：实际情况尚缺乏分析研究），即所谓中国文明是连续的，而其他古代文明均表现为中

断了,即所谓的断裂性。所以,中国人对文明的崩溃研究极少关注,至多是从传统王朝兴衰角度对夏商周诸政权给予一定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往往专注于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特征”和“发展”的研究,乐于将一个个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展现于公众面前;而对于曾经辉煌的一个个古代文明是如何消亡的,原因是什么,往往疏于研究。笔者认为,在当代人类面临种种危机的形势下,对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文明崩溃的研究意义同样重大,它也许对我们认识当代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从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角度看,首先,只有我们承认古代中国文化是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各区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虽然我们承认多元文化有融合与互动,但随着文化的一体化,必然有些古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了,有些则衰亡了,或沦为地方性次要的文化传统。从这一点讲,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同样有大量的关于文明崩溃的案例需要去研究,例如,随着中原地区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周边的一些曾经高度发达的区域文化则衰落了,消亡了,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关中地区的龙山文化、山东岳石文化,以及夏商周时期的诸多区域文化,如巴蜀、东夷文化等等。它们的去向如何?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如何?它们的衰亡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它们的兴衰与中原地区文明的发展是否有关?因此,对于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周边诸文明的不同发展轨迹及其崩溃原因的探讨,也应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又以夏商周三代更替来说,从传统的史观角度看,无疑是同一族群文化内部不同统治集团对权力占有的变化。但如果从古代多元文化史观来看,它们是不同的区域文化的此衰彼长,统治权、主导权发生转移、更替,一个文化衰退了,另一个文化兴起了。从这个角度看,三代时期同样存在文明的衰退、重组问题。

其次,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演变,表面上保持了一种文化延续性,实际上发生了多次实质性的分解及重组,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的。笔者认为形成中国文化是延续的、古今一体的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悠久的以正统史观和“大一统观念”,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一元史观”,指导修史的传统、古今延续的汉文字系统,黄帝世系的祖先起源神话体系,由礼乐文化演变而来的儒家哲学体系的影响。实际上,中国文化同样是发展变化的,现代我们普遍认同的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与古代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并不相同。现代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是不同历史时期多种文化交流融合和拓展的产物,并非古已如此。在这一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文化之间不断接触、交流,直至互相学习、融合,由此,中国文化的面貌、内涵不断发展变化,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族群和政治区域不断扩大<sup>⑤</sup>。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农民战争都是一次已有复杂社会的崩溃和社会组织、文化、资源的再调整。只不过它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激烈的最后手段的形式。其原因是专制政治体制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能避免重大人员、财产损失的微调机制,如民主体制。

不同的文化,因自然环境、人文背景和政治结构的不同,其衰亡的原因正如其兴起的原因一样复杂多样,不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中国古代历史情况也应如此。根据以上文明社会崩溃理论,结合中国古代文化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史前中国至少有以下两类古代文化的衰变现象与之有关:

**第一类:二里头文化兴起与周边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关中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衰变**

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关中龙山文

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衰变现象已为学术界所注意。有学者指出接近距今4000年之时，山东龙山文化突变为岳石文化，良渚文化突变为马桥、湖熟等文化。龙山与岳石，良渚与马桥、湖熟，时代虽前后相接，文化面貌却缺乏紧密的承袭关系。岳石与马桥、湖熟诸文化遗址的分布密度、居址的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水平，又皆远远小于或低于龙山、良渚文化。由这两方面变化所造成的总印象是，岳石、马桥、湖熟诸文化不是龙山、良渚文化继续向上发展所演变来的，而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族群人口大为减少，文化处于低落时期的遗存<sup>⑥</sup>。这些变化非常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文明崩溃的特征：大政治体的碎片化和文化传统的中断。有学者认为“江南地区的百姓，在良渚社会上层离解后，生活水平，似乎并不降低，甚至还在不断提升”<sup>⑦</sup>。关中地区龙山文化的崩溃则表现为另一种形态：根据我们的调查，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数量和规模均大为增加，显示出人口繁盛，文化繁荣。龙山时期，继续保持了这一发展势头，聚落规模更大。从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关中地区基本保持了连续性，持续发展。但到夏至商初时期，能确定的遗址和考古学文化基本没有，即在当地未见龙山文化的后续者，虽然在关中东部与豫西接近的地方有二里头文化性质的遗址，如华县南沙村<sup>⑧</sup>。关中西部的郑家坡类遗存和刘家类遗存也有学者将之上推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但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商代前期，商文化出现于关中东部，商中后期，商文化因素发展到关中西部一带，其后，先周文化遗址又逐渐增多，并渐趋繁荣，至西周时期，这一地区的人口和文化又再一次繁盛，聚落分布密集，成为西周京畿地区<sup>⑨</sup>。关中地区龙山文化的去向一

直是个谜。陶寺文化的后继者也不明确，晋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的敛口折肩甗、敛口瓮、单耳瘦腹罐、单耳杯等，同当地龙山文化同类陶器虽然似有联系，但总体来说，尚无可靠证据说明它与陶寺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作为石家河文化重要中心的石家河城址的废弃也发生在龙山时代<sup>⑩</sup>。

良渚文化的衰变研究是迄今中国考古学界关于古代文化体崩溃研究讨论最多的一个题目。迄今关于良渚文化衰变原因的讨论存在以下几种主要观点：1. 水灾说。这种观点认为造成良渚、山东龙山文化衰落的原因是4000多年前发生的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处于长江、黄河下游的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受害最严重，导致文化的衰落。而对大河、大江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sup>⑪</sup>。2. 宗教极端化说。“峰值期的良渚社会是一个宗教色彩极其浓重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被笼罩在厚重而偏激的宗教气氛里，为此，社会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而这些付出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显然不会有任何正面效应。良渚社会包括中下层在内普遍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也使得它带有更多的消极色彩”。“良渚文化峰值期复杂精巧的社会分工与分层结构，意味着其整个控制系统的庞大和复杂，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严格的秩序性也意味着该系统形式上的僵化，而宗教势力对社会管理组织的大范围介入，又使得整个系统染上了强烈的极端化色彩”。一旦各种矛盾激化尖锐起来，而社会的控制系统又完全失去作用的地步，社会很容易就走向崩溃<sup>⑫</sup>。3. 对外扩张失利是导致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说<sup>⑬</sup>。4. 政治系统功能失效论。“良渚社会体系的危机，可能正

在其文化最为鼎盛之时出现。在大量劳力投入浩大工程，建筑宫殿、陵墓与祭祀中心时，在精工巧匠耗费心力，取得贵重玉材，制作精美玉器（图版六）时，良渚社会上层领导功能就消失了”。到良渚文化末期，因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不再需要，和青铜文化的引入导致区域自主倾向的兴起和边缘地区，如宁镇和太湖地区的独立趋势。良渚核心区失去领导权，不能聚集足够的资源与人力，良渚文化崩溃<sup>⑭</sup>。

关于陶寺文化的衰变原因，迄今研究还很少，有学者提出陶寺晚期有激烈的内部阶级斗争现象的存在。表现为扒城墙、毁宫殿、平宗庙、捣王墓，在没有外族入侵或大规模对外战争迹象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残酷的暴力行为如馘首、虐杀（图版六）等，这些都迥异于新石器时代常见的血亲复仇，似乎是国家社会政治矛盾与阶级对立的特有产物<sup>⑮</sup>。

我们必须承认，以上各种观点都是假说，是学者们的不同推测，要想证明谁对谁错，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搜集足够的证据。况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许多假说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是无从证明的<sup>⑯</sup>。不过，我们可以用反证来证明哪些假说可能是不成立的，比如洪水说，有学者指出“水患是江南水乡泽国的常态。自从河姆渡文化以来，高脚干栏屋、舟船交通、水稻耕作多少都是针对自然环境而发展的文化特质。良渚人不会对水患一筹莫展”<sup>⑰</sup>。从环境的异同角度来说，关中、晋南与豫西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基本一致，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不断兴盛发展，而晋南的陶寺文化和关中地区的龙山文化则衰落和完全消失了。因此用环境、气候变化、洪水等原因来解释这些地区文化的兴衰似乎也不成立。流行性疫病引起文化崩溃也无可能，因为这些地区毗邻，文化交

流自古存在，流行性疫病不会只影响这个地区而不影响毗邻地区。

如果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发展与周边文化的衰变结合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点新的假说。过去，我们在推测关中西部周原地区龙山文化消亡的原因时，曾提出：“结合中原地区的文化变化，从不同时期这一区域文化的兴盛、进退看，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兴盛的龙山文化以后，七星河流域聚落和人口处于衰落时期，正是中原地区夏至商初文化兴起，国家出现时期。中原地区（与关中毗邻）国家政权的兴起与关中地区文化的衰落可能有某种联系。或者说，中原国家政权的兴起引起了毗邻的关中地区文化的衰落。”<sup>⑱</sup>

从时空关系看，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关中龙山文化、陶寺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虽然分布区域不同，但均毗邻，不同文化区域之间很早就有接触和交流，时间上也可以说基本同时，虽然也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稍早。从发展过程看，中原地区从龙山文化兴起后，至二里头文化一直在持续发展中，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非常明显，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如东方的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东南的马桥文化<sup>⑲</sup>。这种密切的传承性是学术界公认的，也使学术界对于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划分界限和夏文化从二里头文化上推至河南龙山文化哪期争论不休。与之相反，随着中原龙山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从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的不断兴盛，山东龙山文化、关中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纷纷走向崩溃，甚至消失。龙山时代的多元的不同区域的文化政治体消失了，各区域政治中心废弃了，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巨大聚落出现，它的规模、出土物的精美程度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礼乐等级

都是在广大区域内惟一的,具有天下之中的气象。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传播到遥远的地方,如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江淮地区,甚至长江以南地区,显示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政治渗透力。

综上所述,排除掉环境、气候、自然灾害等原因,笔者推测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兴起是导致周边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关中地区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甚至良渚文化衰变、消亡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具体说出中原文化促使这些周边文化崩溃的具体过程。但原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的广富林遗址中出土有中原玉油坊类型文化因素<sup>⑩</sup>,江淮地区常见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接替良渚文化的马桥文化中存在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sup>⑪</sup>;这些迹象都让我们感受到中原强势文化在扩张过程中是如何不断排挤周边文化,削弱或消灭各个独立或对立的政治体,将自己的文化加诸其上的行为。由此也提醒我们研究二里头文化的发展模式和政治体系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模式奠定了中国后来历史上视“天下一统”为常态,视多元共存为乱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

## 第二类:生态脆弱和气候变化敏感区域的红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的消失

从文化的演变、更替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来看,鄂尔多斯地区早晚文化之间的文化因素传承关系不明显,文化面貌差异大,早晚文化之间的过渡环节不清楚。比如朱开沟文化与其后的西岔文化之间,西岔文化与其后的以西麻青墓地为代表的文化,及更晚的毛庆沟文化之间在陶器群构成和器物形制方面,以及葬俗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虽然在青铜兵器、工具方面,早晚青铜文化之间也有一定的承继关

系<sup>⑫</sup>。这种差异可能不仅反映了文化面貌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也可能反映了这一地区不同时代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即由农业定居生产生活方式到半农半牧,再到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可能反映了不同族群在这一地区的进退斗争。这种文化的变化是由于当地文化自身为适应环境变化而自我调整、演变的结果?还是更遥远的北方游牧族群迁入、取代,即不同族群文化更替的结果?

有学者提出:“像李家崖古城居民这样的武装化人群,约由公元前1400—1300年起,沿着今陕、晋、冀三省之北分布。这种人群的出现及其性质,说明了气候的干旱化迫使农业边缘地区的人群南移。在此山岳地带,一方面这些人群更依赖畜养动物。为了让动物有足够的草食,他们无法在一地居留太久,另一方面,为了生存资源,他们经常彼此,或向南方人群,争夺适于农牧之地。”“公元前1300—600年之间一连串的自然与人文因素,后来终于使得晋陕冀三省之北的山岳地带成为‘华夏’的边疆,而鄂尔多斯及其北方则成为游牧世界”<sup>⑬</sup>。

这种假说是否成立,对研究朱开沟文化的衰变和北方游牧文化的起源都是关键,值得进一步考察和验证。

与鄂尔多斯地区古代文化衰变既相似又不同的另一个地区是赤峰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小河西文化,到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赤峰地区的古代文化彼此之间虽然在文化面貌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基本文化面貌上还可以明显看出彼此之间许多文化因素的传承演变痕迹,如筒形器、石砌建筑物、女神崇拜等等。文化之间的演变环节也往往有迹可循。

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从早到晚均显示明显的定居农业文化色彩;虽然狩猎、畜牧文化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占比重可能有一定的变化。在北方这类生态脆弱和气候敏感区域,人类文化对气候、生态变化的反应也更为敏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口的增减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对生态的影响明显;反之,生态的好坏和气候的变化也更明显、快速地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口的增减、社会组织以及文化面貌的变化。这些表现为古代不同时期文化的兴衰更替。在这一背景下考察红山文化的崩溃,我们可以说,它不是消亡或生产生活方式的完全变化,而可能是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变化或气候变化导致文化的调整 and 变化。有学者已注意到,“红山文化的后期约在距今5500—5000年,根据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这一时期正是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较为突出的变化是温度的降低。这一时期,恰好是红山文化由盛转衰的时期”<sup>④</sup>。

两个地区古代文化面貌显示的这种区别主要是环境的差异,比如鄂尔多斯地区生态环境比赤峰地区更脆弱,雨水条件更差,承载能力更弱?还是因为周边文化的差异以及接受的影响和承受的压力不同?

### 余论:文明崩溃理论与中国古代王朝灭亡原因探讨

关于王朝灭亡的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论文很多。比如对商周王朝灭亡原因的讨论,每个朝代的统治者以及历代学者、政治家都在不断分析、总结以前朝代的盛衰兴亡经验,以为自己巩固统治、避免失误之镜<sup>⑤</sup>。但过去的研究,多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和行为以及政治制度设计上找原因,即使有自然灾害原因的记载,也是放在“天人感应”的儒家道德体系

内去使用。近现代又用阶级斗争理论去解释。现在,利用文明崩溃的理论,我们应该拓展视野,从更多的角度分析各朝代灭亡的原因,比如,战争与外敌入侵,政治体系失序,子系统间关系失调、调节应对功能失效,中心与边缘关系破坏等,资源开发与国家兴亡关系,生态、气候变化与王朝兴衰关系,人口增减、自然灾害,如干旱、水灾、地震、流行性疫病等是否在王朝衰败中发挥了作用,等等。由此可见,对各王朝消亡的研究应该纳入文明崩溃理论研究的视野中,利用文明崩溃理论去重新研究古代各王朝的衰落对我们深化古史研究有重要作用。

- ① The Collapse of Ancient States and Civilisations, Edited by Norman Yoffee and George L. Cowgill,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ucson and London, Third Printing 1995.  
Joseph A. Tainter,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8.
- ② [美] 乔纳森·马克·基诺那著、张春旭译《走近古印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③ [英] 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④ [美] 诺曼·哈蒙德著、郑君雷译《寻找玛雅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⑤ 徐良高:《一元抑或多元: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再考察》,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2期,2004年。
- ⑥ 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 ⑦ 许倬云:《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 ⑧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 ⑨ 周原考古队:《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2002

年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

- ⑩ 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 ⑪ 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 ⑫ 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 ⑬ 芮国耀：《良渚文化时空论》，《光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 ⑭ 同注⑦。
- ⑮ 何弩：《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 ⑯ 同注⑪。
- ⑰ 同注⑬。
- ⑱ 同注⑨。
- 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

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5-1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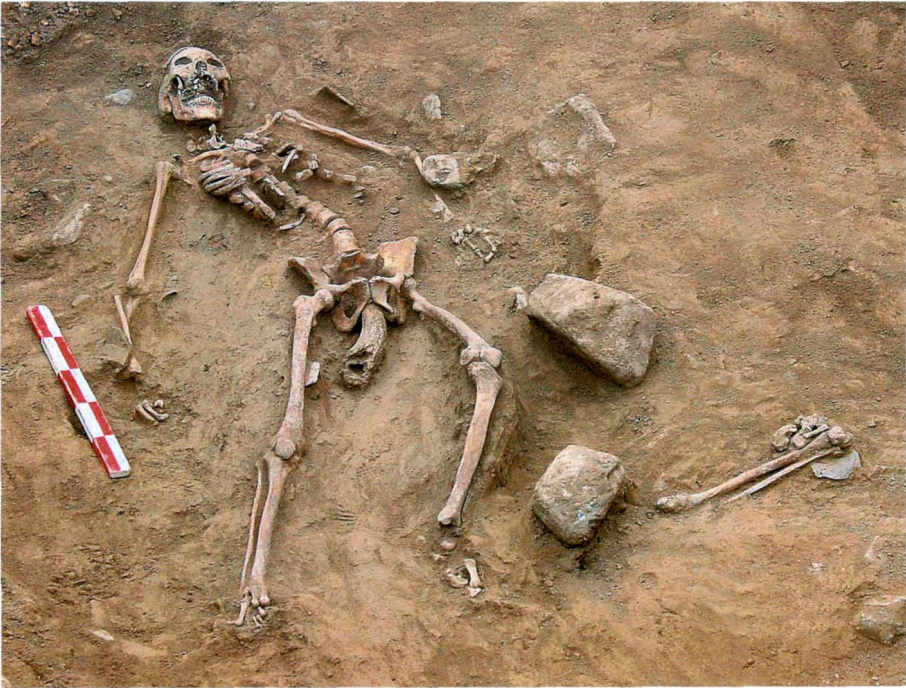
- ⑳ 广富林考古队：《广富林遗址的发现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00年9月13日，第3版。
- ㉑ 邹衡：《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三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 ㉒ 曹建恩：《内蒙古中南部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简论》，中韩共同学术调查报告书（一）《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2006年。
- ㉓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3-94页。
- ㉔ 王巍：《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 ㉕ 徐良高：《商周灭亡原因辨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责任编辑 李露露）





浙江余杭反山出土玉琮神人兽面像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虐死者遗骸